

姜亮夫 文录

姜亮夫著作选本



云南人民出版社



姜亮夫著作选本

姜亮夫 文录



云南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姜亮夫文录/姜亮夫著.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9. 11

(姜亮夫著作选本)

ISBN 7-222-02865-X

I. 姜... II. 姜... III. 文学-作品综合集-中国-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1999) 第 50111 号

姜亮夫文录

姜亮夫 著 姜昆武 选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 100 号)
邮编: 650011

云南地质矿产局印刷厂排版
深圳宝峰印刷有限公司印装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9.75 字数: 223 千字 插页: 1
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册

责任编辑: 王小燕

封面设计: 王玉辉

ISBN 7-222-02865-X/G·570

定价: 20.00 元

若发现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

01010435645T 郑州大学图书馆



姜亮夫先生
(九十岁时摄于杭州大学校园)

Qa-3p.01

惜分飛

滿院薔薇開遍了芍藥含苞小花訊
依然好因風夢與相思道

碧淺青天偏杳渺
咤蝶嗔鶯懊惱悶則
金樽倒紅樓新月紗窗悄

憶江南

原意

壬午五月十九日

清早起无意便聞鶯料想江南天外路花
嬌柳恨正生情芳草又連塍

客來恨燕子已還家若問庭園伊處好輕
輕嫩柳碧如紗隱約遠山遮

目 录

论余杭先生学与徐一士三书	(1)
思师录	(10)
龚向农先生传	(26)
四十自述	(34)
《汉赋之史的研究》序	(46)
为《屯石居古印摹释》序	(48)
为女儿《诗书成词》印行进而教之	(51)
《词选笺注》自序	(53)
北洋余毒毁法纪略	(62)
《有清一代之中俄关系史》跋	(67)
前陆军中将政协全国委员张君墓志铭	(70)
《成均楼论丛》序录	(73)
《中国妇女与文学》序	(119)
《文学概论》补序、小言	(122)
中国学术原衍阐微	(124)
研究国故应有的基本知识与应备的工具书	(134)
中国学术之范型的勘察	(151)
悼刘半农先生并介绍《四声实验录》	(161)

忆清华国学研究院	(168)
忆成都高师	(181)
《散文选》论略	(195)
“词”的原始与形成	(204)
“史”与“神话”的邂逅	(229)
中国文字的特色及其在学术上的地位	(237)
《诗经》的体类	(240)
我系念中的故乡	(246)
自 传	(248)
欧行散记	(254)
后 记	(309)

论余杭先生学与徐一士三书

第一书

一士先生史席：顷于《国闻周报》二十五期，读大文载同门孙思昉君《谒余杭先生记语》论某公好奇一段，有“今则以今文疑群经，以臆器校正史，以甲骨黜许书，以臆说诬诸子”云云四语，细审文义，觉语气轻重急徐之间，与不佞所闻于先生者，小有同异，岂弟子退而异言者欤。此四语适为不佞所曾轻尝，而三数为先生所申诫，又为近来学人所执以为先生疾者，不敢秘其所闻，一任世俗耳食之言，厚诬先生。然先生自有千秋，亦不敢为调停之说，以取售于当世，敢举其平日侍坐所闻一二小事，为阁下陈之。

一、以今文疑群经 先生于经为古文家，此举世之所共知，而壁垒甚严，亦举世之所共知，然于今文家之严守家法者，亦未尝轻蔑。忆井研廖先生既歿，有欲求先生为墓文者，不佞以此进叩，先生惘然相语曰：“季平墓志，非我亦不能为。”而于南海立说之不纯者，则颇见诋讥。至廖、康而后，先生未尝以经今文家许人，今人亦实无一以今文家之立场疑群经者。疑群经者钱玄同君，号为魁首，钱君固先生弟子也。故“今则以今文疑群经”一语，似觉轻重之间，尚可商量。忆初谒先生时，以治经请，先生言以经视经，则宜守家法，不可自乱途辙，杂揉今古。盖不佞亦尝请益于井研。故先生以此绳之

2 姜亮夫文录

也。大抵先生于当时说经者，皆病其杂乱抄撮，不见矩矱。非必如早年于今文家之说，一意作主观之批评也。

二、以赝器校正史 此事与下文“以甲骨黜许书”二语，大为当时学人所诟病，盖先生早年于此，固曾张其挹伐，盖阮、吴诸家之说，不足以服人，而甲骨出处不明，又无其他有力佐证，当时倡之者，如刘铁云辈，又非笃行纯学之士，孙诒让亦谨严无他规模，以一融通四会之学人，欲其贸然承认一种新学问，有所不能，亦有所不可，故早年之指陈吉金甲骨之弊宜也。近年来甲骨铜器之出土者日多，研治者途术亦日精。先生早年之说，似已不甚坚持。忆二十二年上海同福里座中，偶谈及先生为某氏跋散氏盘中语，先生曾言许叔重《说文》亦采山川鼎彝，故金石非不可治，惟赝器太多，辨别真伪，恐非目前世入学力之所能及，故以证文字，大体尚可寻其颃理，以证史事，终觉不安。证史不安云云，则谓先生蔑弃鼎彝，不如谓尊史过甚为能得其实。先生民族情思最切，近来国事日非，故其缅怀故国之情益甚。晚年以读史召群弟子，而于含“刚中”思想之儒行一文，复数数为世人倡导，其救民之忧，非哗世取宠者之所能望其项背。

三、以甲文黜许书 先生早年之不满于甲文，其原因已如上陈，惟以其所疑，至晚年仍不得解，故对甲骨之态度，较吉金为严肃，而尤不喜人以甲文证古史。忆初谒先生时，先生知不佞为海宁王先生弟子，即谓治小学当以许氏书为准。二十二年春夏之交，苏州国学会邀不佞演讲，大意以甲文为中国较早之文字，推证八卦后于甲文，易为春秋战国时术数之学。讲稿刊布后，先生大不悦，以召同门诸君。即不佞游大梁归，已传言唧唧，趋锦帆路拜谒，先生温语慰之曰：“凡学须有益于人，不然亦当有益于事，古史诚荒渺难征，然立说固与前人违异，

亦必其可信乎？治小学为读书一法，偶采吉金可也，泛涉甲文以默契于心，出之以谨严，亦可也。必以此而证古史，其术虽工眇，要近虚造，不可妄作！”继则以“食肉不食马肝未为不知味”为解喻。去年有欧洲之行，先生赐之食，又温语以顾亭林、王而农相勉，复言甲骨不能相信。不佞笑以请曰：“倘有的证，足使先生信其为殷商时物，则先生亦将为之鼓吹乎？”先生笑曰：“但恐君辈终不能得的证耳。”大抵先生于甲骨文因其“来历不明”而疑之，此固治学谨严者应有之态度，世人方以此见诟，盖不思之甚耳。

四、以臆说诬诸子 不佞于诸子素少究心，故侍座时亦从未以此请益，惟少岁偶读《唯识论》后，因以喜读先生《齐物论释》，然多不甚了了，尝一以请教，先生自谦为“此亦一种说法”云云，他无所闻。孙君所究以诸子，平素所得当较为多。

要而言之，先生于近日学人，皆叹其根柢太浅，言经者泛滥杂抄，不明家法，而研习吉金甲骨者，既好立异说，不本于载籍，而又好捋扯正史，既无益于人，亦无益于事，为治学者所当慎择。细绎先生晚年言学之趣向，大约有二，一欲救世以刚中之气，一欲教人以实用之学，而要其归在于不忘宗邦之危。刚中则夸诬奇觚皆在当砭之列，实用则怪诞诡譎皆在宜排之数。变更旧说不轨于典籍，或有危于宗邦者，皆为心所甚忧，此其大校也。不佞所闻如是，所关虽不甚大，然亦为学术上之一重公案。孙君所记，语意有待于疏说处，故为补说如是，尚乞附尾大著，使世人勿误解孙君之言，则幸甚矣。途中未以书自随，故但能举此以为验。俟归国后当为阁下再详之不一。

第二书

前书仓卒，不意有“相网无碍”之誉，愧甚愧甚。孙君更举余杭先生自书及亲自鉴定之言以存信说，较不佞为翔实。细绎文义，幸鄙说之无大违离，于本愿已足，不欲更有他说。惟近来读此文者，颇有误不佞为有所折衷。此四语之深浅，本不足为余杭损益，然与前书初衷颇异，欲为误者一解，用再为申说，即杂引孙君所引各文为喻。

一代学人，自有其一贯之学术思想，此吾人所当知者。先生学术之中心思想，在求“救世之急”，蒯汉微言之所以作也。而其方法在教人不忘其本。不忘本故尊史，春秋史之科条毕具者也，故宗春秋。然今文家亦言拯民，亦未尝不言尊史，则史以何者为可征信？公穀多杂阳阴怪迂之说，说人世惟左氏最平实，而司马、班、陈皆衍其系，为数千年史宗。故凡先生微义，在于尊史，而左氏传为之俶始，以其不为怪迂之说也。此十年前读先生书一得之愚，虽证例未俱，而自信不诬也。此义既明，用以审量兹四语，则前书所陈，不待申言而明矣，兹再诤谏析之如次。

一、以今文疑群经 今文家一般之现象，在杂揉阴阳五行家迂怪之说，易诗不关史事，（此举大者言）《尚书》所争多在字句间，独三传异说最为奇诡，而公穀杂揉为尤甚，以人事推之迂怪，所关更不仅于礼乐制度之间，故自东京以来，三传之争最烈，“三统”、“三世”之说已令人迷惘，而“素王为汉制法”之语，实等俗世推背图烧饼歌之流，实大不经。故先生之辟今文，亦以说公穀者为最，（于公羊之说则主弃董何而存其真。此于侍坐言之）而《尚书》次之，诗三家之异，盖已不甚

过问之，（此亦就量言之）是则先生之辟今文者，盖辟其怪迂不近人情之说，非辟全部之今文。如南海必以一切古文经为刘歆一人所伪者也。此即以孙君所引先生论汉学一段语，已大可作吾说之证。“吴广张角”之言，其微义诘不令人沉痛哉！故“以今文疑群经”之语不佞所欲为申说者，以为不可以辞害义，必欲明以章之，则或可申其义曰：今则以今文“怪迂之说”疑古史，重在怪迂。一语之真义，往往当贯其学说之全部。世或将以此词面之言概先生，而耳食不观全书者，将以此致疑矣。

至思昉君哲语“南海新学伪经考出”云一段，为另一问题，更望阅者勿以与余杭先生之说相牵合，则幸甚矣。

二、以臆器校正史 先生既尊史而又有所征信，自不容妄疑信史。本此一贯之主张，则以吉金文订古史，盖已违异，大可商量。（此不仅于尊史如先生者所以为不可，即海宁王静安先生，博涉群书，贯穿金石，其所论列亦甚精慎，但读《观堂集林》者，无不能见之）先生之所甚虑者，恐放者为之，而忘弃旧史掇扯作祟也。然于吉金本身，亦相当承认其价值，一则曰：“以器物作读史之辅佐品则可，以器物作订史之主要物则不可”。再则曰：“今人欲以古器物订古史，第一须有精到之眼光，能鉴别真伪，不爽毫厘，方足以语此。”又曰“钟鼎伪造者多。”（皆见孙君前文）其言之平实近人，虽强狡亦无可辩，孙君所引之证，较不佞前书所言为犹温婉矣！大抵世人于先生行事与学术，有一种误解，少年有激论、中年有激行，（即孙君所记廷辱袁项城一类事）而世又传雅谑之号，因以想像其学为戈矛森列，又意其为温婉平易，不伪不饰之学者也。

三、以甲文黜许书 经古文家多究心小学，故两汉经古文家几无一非小学家。先生于小学，沉雄劲伟，贯穿音义，有三百年来过人之处，然于字形则不甚究心。而甲文之要则在于

形体，其事遂大相左。且甲文形体又与秦篆殊，亦因与汉人所重订之经典文字殊。此事既与尊史之见不相吻合（以其必改史以就甲文故），又与己所持之音义一贯之见相扞格，而征之载籍，则“无足信赖”，故先生辟之，语无游词，而致疑于龟甲兽骨之存在，盖必有之结果。孙君所引两文，皆足以证前书“先生疑虑晚年仍不得解”之语，惟鄙说有“泛涉甲文，以默契于我心，而出之以谨严”云云，似不甚相合。此或因不佞于甲文偏爱之甚，先生知其集习不能改，故因其器而施之教欤？

四、以臆说诬诸子 此事前书既无所陈，则兹亦无可辩说。

总之，先生除甲文外，其他三事皆决无偏执之意。意有急舒，言有畛界，此不佞所为汲汲然争辩者也。上文所陈，皆本于先生之意以立言，是非自当有归于至当者。不佞于先生之说欣佩无既。然尚有一言不能不为世人告者，先生治学之趣向（目的），与今世学人不相合，此亦不容为讳。近世治学之趣向，在于求“真”，而先生治学之趣向，在求“用”于救民，苟易词以明之，则求真者在无我而依他起信，而求用者在为我而求其益损，求用者在不离故常，（离故常则不可用故）而求真者或且毁其根株。此中并无绝对之是非。此意不明，则论先生者心不免于诬妄，而拥护之者，亦未必得其本真。此前书所以有综合先生之学，标举二旨，曰：“救世以刚中之气，教人以实用之学”也。此义既明，则一切毁誉皆当是是非非，各归于至当矣。不佞尝谓近代有四学人，其学说可为过去数千年及未来时日作枢纽者，则先生为经小学之纛，井研为经今文之殿，海宁开考古之系，新会启新史之途。不幸十年来先后辞世，使天祸中国从此而斩，则四先生其将为华夏学术之殿乎！若黄裔不丧，则四先生盖必为后世之宗师矣。俟归国后，拟合

四先生为四君学谱一书，下愚如不佞，不知此志能有成否也。信笔曰布意，不觉其长矣，不一叩候。

著福

第三书

孙君第二次辩论，已见周报三期。近以一小小译事，书案纷沓，日不暇给，而孙君申辩已非旧时论点，故不欲再有所论列。顷闲再翻周报，仍觉有不能已于言者，再拉杂为阁下陈之。

前书“求真”、“求用于救民”之言，本为举世之纷纷者发，得孙君一揭，使此义益彰，不胜欣快。然果无申释，则不仅不足以解世人之惑，即孙君久亦未必能相谅矣。

凡有所成就之学者，必有其道之“全”，然发言盈庭，不能无因时因地而有所摇演谢短，故吾人之论是者，当先得其“全”，得其全，则是非正反真寓之语，卮言曼衍之词，皆各有其归向，亦各有其相得之谛。自休宁戴氏以来，其学足以抗代而确有其“全”者，余杭先生其人也。弟所见余杭先生之“全”，即第一二两书末段所申之辞，而第一二两书又皆为此“全”而分解条析者也，即无一语不为此“全”辩。然孙君于弟前书条辩分别之言，既已无说，而独标举此义，于弟立论之基，似尚有未晰，而引用证据，似又是先生为某一部分说法之言，（辩见后）有所倍申谢短，孙君岂仅见其分而未见其全欤？

且即以孙君标举之义而论。弟言“求用于救民”，孙君裁为“求用”，似已非本义，今且不细论。

所谓“求用”与“求真”言，其实并非对立之两事。弟言求用于救民，然未尝言先生“不求真”，惟先生求真之态度，

8 姜亮夫文录

与今世学人异。今之学者为真以求真，而先生则为用而求真。苟以俗设喻，则先生先有一副救民之心，而以此心笼罩一切学术，近人则只有所向往之学术，而不顾其他。此为推心之论。再以学设喻，举大者言，又以《庄子》内圣外王之说为解，先生盖以求为外王之思而修内圣之道者也。更以儒言为喻，愈益明曰，即《大学》格致修齐之义。今人求学为格物而格物，为致知而致知，前书所谓依他起信也。先生则意在为修齐而格致，不关修齐者不必格致，既格既致，即是求真，故不反对求真，且亦拥护求真，弟亦不言先生不求真。其实举中国数千年来儒者一贯之精神而言（甚至于老庄亦然），便无不是以求为趣向，凡稍涉哲学之门，皆通道之。孙君所闻与弟有异，欲以此两事为对立，仅为先生争一“真”字，而又于第二书中（周报十四卷第三期中之第二书也）“务期有用”之语回惶自护为第一义谛、第二义谛之言，其实苟即鄙说而裁之，正不必以为有异也。至谓“而言其异则所谓一致而百虑，言其同又所谓殊途而同归”云云，则为文家虚调，而远于辩章学术之义矣。

更退一步言，以孙君所引先生于王鹤鸣书而论，此先生以古文家之资格，为经古文作拥护者也，诚有“学者将以求是，有用与否不暇计也”之言，然此时为经生发，为拥护古经文之经生发，为制敌而发，所谓摇演谢短之说也。果必以此而谓不求用专求真，是最真之学莫过于“有规矩绳墨，审谛如帝”，而最疏者莫过于“观世文质而已”，（有规矩观世三语皆孙君引先生与王鹤鸣书中语）孙君亦将何辞以为解？弟手中无先生书，不能自为其说多引佐证，即就此次孙君两文中所引之言而论，已足大成吾说。如三十六期引论经史……不应……疑一文，于以碑版补正史列传之缺一事，而曰：“此就系小节，无关国家大体。”又曰：“研究历史须论大体，岂暇逐琐屑之末

务？”此岂纯以一真字而可辨章者哉？又曰：“我能知两万万人之姓名，事固非易，要亦何用”则明标“用”字矣。

此次讨论之点，已非前两书论旨，弟本不欲再答，以灾周报篇幅，然此事确又为前两书论点之基础？且亦即两人立言所以异之质，故不能不一言。近日事乱如麻，而此行来欧，篋中无线装书。余杭丛书不仅续篇不能得，即正篇亦偏觅不得，故不能有所引证。俟归国后，当更为文申之，而此次辩论亦请暂止此纸。

（原载《国闻周报》1936年）

思师录

荀卿言：“通利思师”，余一生无大危难，而蹇产不舒。家君戒其“安于寂寞”，此其所以无通利之业也。然一生求师至切，自就外傅，日渐于小学、史籍行事，年八十，于学似略有所得。回旋而思，皆诸大师之教也。曾为《四先生合谱》以志之，而毁于云南解放。大劫于文革。而片金碎玉尚能追忆者，因急记之，所以志其学之自，亦以悲其学之无成，诚钝根人也，固当如是。其实如梅贻琦、赵元任、吴检斋，蜀中之廖公、李公（植，字培甫），初亦在回思之列，而简涩无以为说，故姑以林、龚、梁、王、章、陈六先生声音笑貌之深有存于心者，略记之已耳。

林山腴师

余以官费与其他三人同抵成都复试，余以第一名录取，次日奉召参拜校长吴玉章，以“业精于勤”及“敬业乐群”相勉，此第一次受教。入校后知国文部有林先生山腴国文课，同学先应置《汉书》一部，遂赴存古书局得尊经阁刊本四史。是为余至蜀购置典籍之始。

林先生讲《汉书》第一堂，告诸生各备《书目答问》一册，告以“从头到尾看过，照我所作记录入自备册中。立例三圈为第一等，二圈为第二等，一圈为第三等。无圈者不读可也。”因教以为求学次第，必先略晓各学内容及派别。《汉书·